

1950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方案興廢 背後的語言政治史

吳 啟 訥^{*}

摘 要

近代突厥語族文字的改革，是一個與政治因素相關的議題；在不同帝國、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間，這一議題也有政治和文化上的連動關係。本文在探討奧圖曼—土耳其文字改革、俄—蘇境內的突厥語族文字改革對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影響的基礎上，觀察1950年代中共主導下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過程，檢視其背後的語言政治史線索。現代國家通常都會制訂以國族整合為目標的語言政策，但其實踐過程，往往必須在國族整合與保持文化多元之間尋求平衡。1950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拉丁化方案的興廢，呈現出這種理想狀態失衡的後果。

關鍵詞：新疆、突厥語族、維吾爾語、文字改革、語言政治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Language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C's Turkic Script Reform Policy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Zhe Wu^{*}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script of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is a topic related to political factors. This particular issue also h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nkages between different empires and different modern nation stat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urkic script reform in Ottoman-Turkey and the Russia-Soviet on the reform of Xinjiang's Turkic scripts, observes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of the Turkic scripts in Xinjiang under the regime of PRC in the 1950s and examines the clues of language politics behind it. Modern nations usually formulate language policies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tinization of the Turkic Scripts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this ideal state was out of balance.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Keywords: Xinjiang, Turkic languages, Uyghur language, script reform,
language politic

1950 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方案興廢 背後的語言政治史^{*}

吳 啟 訥

新疆境內的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吉爾吉斯）、烏孜別克（烏茲別克）、塔塔爾（韃靼）等 5 種；¹ 其中，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吉爾吉斯）語長期使用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拼音文字——察合台文。² 新疆境內的突厥語族語言與歐亞大陸上其他的突厥語族語言，不僅在語言學上有密切的親緣關係，在文字改革議題上，在近代族群政治史和語言政治史上，也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

整個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議題，不論在奧圖曼帝國、土耳其共和國，還是在沙俄、蘇聯，抑或在新疆；不論在 19 世紀、20 世紀，還是 21 世紀的今天，始終與政治因素相關。不僅如此，在不同帝國、

*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重要修改建議。

¹ 有必要說明，於 20 世紀不同時期從青海省東部、甘肅省的黃河河曲區域陸續遷入新疆的數千名穆斯林「撒拉」人（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稱「撒拉族」），以及少量分布在新疆北部喀納斯湖附近的「圖瓦」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中，被歸入「蒙古族」），也使用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語言。但這兩部分人除人數較少外，更因遷入新疆或居住地歸入新疆的時間不長，而不被視作新疆的「世居民族」，故本文未將「撒拉語」、「圖瓦語」計入新疆境內的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之中。

² 有必要說明，歷史上，中國中亞地區與中國伊斯蘭受到波斯文化、波斯伊斯蘭文化的重大影響，新疆境內突厥語穆斯林的某些重要歷史文獻，如喀什噶爾汗國的《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是用波斯文書寫而成的。

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議題也一直保持政治上與文化上的連動關係。這一現象，挑戰著學界對於近代國族議題的定見。

本文將就奧圖曼—土耳其文字改革、俄蘇境內的突厥語族文字改革對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影響做初步探討，進而觀察 1950 年代中共主導下的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改革的過程，檢視其背後的語言政治史線索。

一、銜接突厥、伊斯蘭社會的各類「現代化」運動

儘管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分布範圍甚為廣泛，但基於遊牧生活狀態所帶來的較大範圍的流通和交流，使得該語族內各語支、語言間的差異，比其他語系語族內的類似差異要小。易言之，使用突厥語系語言的人群之間，在口語溝通上，並沒有太多不可克服的障礙。然而，突厥語系語言卻一直未能正式形成自身的書寫體系。10 世紀以後，伴隨阿拉伯勢力在中亞的統治地位的確立，不僅阿拉伯語成為官方語言，阿拉伯文和其字母也很快流行，取代了本地區其他的書寫系統。突厥語系各語言也幾乎都開始採用阿拉伯字母拼寫。³

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和閃含語系的阿拉伯語之間當然有很大差異，套用一個截然不同語言的表音字母，當然會造成更大的衝突。例如，突厥語的特色是元音和諧，但阿拉伯語卻僅有長短各三個元音字母；如此一來，以阿拉伯字母讀音方式，不易顯示突厥語系諸

³ 儘管位於阿爾泰山北麓的數件古突厥碑銘使用一種源自阿拉伯字母，被學界稱為「盧尼體突厥文」(Turkic Runic) 的文字，但此種文字鮮少用於官方文書或其他文獻中。9 世紀中期後，高昌回鶻人和喀喇汗人曾使用粟特字母拼寫突厥語。但一方面，此種被稱作「回鶻文」的文字使用範圍僅限於塔里木盆地以東；另一方面，自 11 世紀起，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突厥語新文字（後來被稱為「察合台文」），自喀喇汗至高昌逐漸東傳，最終完全取代粟特字母回鶻文。

語言間的語音差異。不過，又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使得操突厥語族語言的人，只要具備基本閱讀、書寫能力，便可以輕易地閱讀包括安納托利亞突厥（土耳其人）在內其他突厥語族兄弟的出版品。同時，由於中亞和西亞地區的突厥語族語言採用與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相同的字母，也方便這些語言吸收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字彙，從而加強了彼此間在伊斯蘭教以外更廣泛的文化關聯。

作為突厥與伊斯蘭世界共同宗主的奧圖曼土耳其，在其近代文字改革的過程中，步上了拉丁字母化之路，則肇因於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應對西方和「現代化」的衝擊。18 世紀以降，奧圖曼帝國面臨從近代西方工業文明和從「民族國家」成長起來的資本—帝國殖民擴張的挑戰；鄰近土耳其的其他中亞突厥語穆斯林人群也開始遭受工業文明、民族主義和近代型帝國主義的壓迫。19 世紀末，居住在窩瓦河（Volga）下游和克里米亞半島，同樣使用突厥語族語言，但臣服於沙皇俄國的韃靼人（Tartar），針對俄國大斯拉夫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的擠壓，發展出「泛突厥主義」論述，⁴ 主張透過西化的近代教育和文化自治，聯合東起阿爾泰山，橫貫中亞，西至巴爾幹半島，所有使用突厥語的人，復興「突厥民族」。泛突厥主義民族復興運動和泛伊斯蘭主義宗教改革運動的主張，呈現為韃靼人社會的新式教育風潮——「扎吉德」運動（Jadidism），教學內容包含現代世俗知識，目標在於以教育協助穆斯林適應現代社會。「扎吉德」教育改革又衍生出突厥語穆斯林社區在文化、社會、宗教、生活方式、政治等方面改

⁴ 活動於窩瓦河下游和克里米亞半島地區的韃靼人，特別是克里米亞韃靼，一方面受俄國統治年代最長，受東正教化、俄羅斯化壓力最大；另一方面，又距奧圖曼帝國中的突厥居民較近，因而受到後者影響的機會較多，而且他們四周都是異族，作為一個實體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與其他突厥集團建立聯繫。因此，泛突厥主義從泛斯拉夫主義那裡抄襲了許多策略甚至術語。17 世紀末期，韃靼人中已產生活躍的中產階級，因而有能力領導 19 世紀後期以來的民族覺醒。泛突厥主義為這個中產階級與俄羅斯人的商業競爭提供了文化武器。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in Turkey: A Study in Irredentism*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81), 3-4.

革，⁵並於 20 世紀前期蔓延到中亞突厥語穆斯林社區及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社區。

由於使用突厥語的各族群在地理上並不相連，因此需要尋找並培植其他因素，以促使它們的整合。韃靼知識菁英首先選中的是語言。儘管突厥語各族群使用的口語不盡一致，但相當接近，且知識分子可以透過「古突厥語」達成溝通目的，障礙在於，突厥語各族群的識字率偏低。唯有普及教育、減少文盲，並應進一步溝通之需創制一種共同語言，方能達成各族群接近、聯合的目標。基於突厥語族內部各語言之間差異較小的現象，泛突厥主義知識分子嘗試制定介於奧圖曼語和韃靼語之間的「突厥共同語」。⁶

土耳其文使用與阿拉伯語、波斯語相同的字母，雖然便於在多元的奧圖曼帝國範圍內吸收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詞彙，有利於帝國的政治整合；但以另一語系的字母作為土耳其語的書寫記號，在拼寫和寫作方面勢必發生諸多困難與混淆。純粹出於語言學的理由，19 世紀初的近代土耳其知識界即已主張文字改革，順便達成排除阿拉伯語、波斯語因素，使土耳其語「純潔化」的目標；在 19 世紀中後期到 20 世紀初，帝國逐漸分崩離析的變局下，文字改革的政治需求日益浮現。⁷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奧圖曼知識界開始向帝國提出改用拉

⁵ 潘志平：〈俄國韃靼斯坦「扎吉德」運動與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西北民族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23-34。

⁶ 潘志平：〈泛突厥主義文化觀的內容與本質〉，收於陳延琪、潘志平主編：《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6-68。

⁷ 當俄國韃靼泛突厥主義者積極奔走之際，奧圖曼土耳其還沈浸在蘇丹哈里發哈米德二世所推動的泛伊斯蘭主義之中。奧斯曼貴族普遍使用阿拉伯語文；知識菁英也認為「突厥」一詞帶有某種貶義，因而選擇了「奧圖曼主義」型（以保守奧斯曼帝國以安納托利亞為中心，統治阿拉伯人等穆斯林的現狀為基礎，包容性大於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在歐洲「突厥學」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利的雙重影響下，土耳其開始重新發現「突厥」，並意識到，喚醒、加強土耳其和其他地區突厥人的民族意識，是民族生存與進步的基石。王樹梅：〈泛突厥主義的由來和發展〉，收於陳延琪、潘志平主編：《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頁 17-41；Landau, *Pan-Turkism in Turkey*, 79。

丁字母的建議。⁸十月革命後，蘇聯中亞的幾個突厥語系加盟共和國搶先開始拉丁化文字改革，更鼓舞了土耳其的文字改革者。

1928 年 11 月，標榜現代化和世俗主義的土耳其共和國大國民議會公布文字改革方案，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拼寫土耳其文，於 1929 年 1 月開始實行。新字母與西方文字、數字、數理公式自左而右的書寫習慣一致，降低了識字書寫的門檻，在現實中有利於國際交往和國際貿易。1932 年，土耳其當局成立土耳其語協會，大力推廣新文字。經過 10 年努力，國民識字率提升 10%，凱末爾推動的世俗化與民族主義進程已不可逆轉。

新疆境內的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文字與奧圖曼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語民族的親緣關係，促成了新疆與近現代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語民族間密切的文化往來，並進一步擴大成爲思想和政治上的影響。1910 年代，俄國泛突厥主義先驅伽思普林斯基的《譯文報》傳入新疆；1914 年，來自安納托利亞的艾買提·卡馬爾 (Ahmed Kemal) 來到新疆阿圖什興學。曾造訪德國、土耳其和俄國的維吾爾商人，也受到窩瓦河下游韃靼人和奧圖曼改革派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穆薩巴依兄弟 (Hüseyin Musa Bay Hajji, 1844-1926、Bahaal-Din Musa Bay, 1855-1928)⁹ 即於 1885 年在阿圖什 (Artush) 設立了一所歐洲式的學校。1890 年，穆薩巴依聘請俄國韃靼人和土耳其人師資；並派遣維吾爾學生前往伊斯坦堡、喀山和聖彼得堡；同時增設新學校，包括在阿圖什的師範學校和在伊寧與其家族擁有的製草場相關的技術工人訓練學校，還在喀什設立了出版社。後來在人民共和國體制中職位

⁸ Nafi Yalın,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Unique Case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World," *Bilim dergisi* 3 (2002): 9.

⁹ 模仿窩瓦河下游的韃靼人 (Tartar)，穆薩巴依兄弟也取了斯拉夫化的名字穆薩巴也夫 Hüsen Musabayow 和 Bawudun Musabayow。1920 年代，爲自己的名字取一個斯拉夫化版本的情形，在曾到俄屬中亞旅行，或受到俄國影響，嚮往俄式「進步」的新疆突厥穆斯林中變得愈發普遍。下文中出現的斯拉夫化的突厥穆斯林姓名，皆出於相同緣由。

最高的維吾爾人賽福鼎·艾則孜(1915-2003)，也成長於阿圖什的一個頗具扎吉德主義色彩的家庭。¹⁰ 返鄉留學生和師範學校畢業生又前往新疆其他城市推廣新式教育。¹¹

吐魯番的維吾爾商人買合蘇提·木依提(Mahsud Muhiti, 1885-1933)在遊說省府和北京失敗後，於1913年在阿斯塔那(Astana)自行創設了現代突厥語文學校，畢業生或出國繼續深造，或辦報，或擔任政府職務。¹² 吐魯番的近代教育，逐漸對盆地四周發生影響，位於準噶爾盆地東部，漢人和東干農民人口比例甚高的奇台，也很快設立了突厥穆斯林的扎吉德學校。¹³

儘管扎吉德新式教育的焦點並未集中在語言文字，但語言文字改革議題的涉入成為順理成章的結果。新式教育最重要的革新在於其教材改變了傳統伊斯蘭經學校教育的目標，轉而向學生傳授西方語文、地理、歷史、科學、數學、會計、突厥語語言文學、宗教和體育等方面的知識。1934年，一度動蕩不安的塔里木盆地南緣局勢漸趨安定，正在擁抱泛突厥主義的青年土耳其黨，派遣十數名黨工，來到喀什—阿圖什地區擔任教師，同時帶來了拉丁化的土耳其文教材、出版品與拉丁化土耳其語文的教學課程。年青的賽福鼎，也參與了在土耳其教師團與吐魯番扎吉德學校創辦者買合蘇提·木依提之弟—喀什

¹⁰ 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13-21。

¹¹ 熱合木吐拉·艾山：《新疆維吾爾族扎吉德教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頁18-23。

¹² 易卜拉音·木依提(Ibrahim Muhiti)：〈回憶啟蒙運動的先驅者買合蘇提·木依提〉，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1-96。

¹³ 1918年，烏孜別克人米爾滿合蘇(Mir Maxut)在奇台縣烏孜別克人的清真寺內，改建教室，創辦近代教育。這所名為花園教育學校的近代學校，聘請了4名來自俄國的韃靼女教師，招收50名男女學生，開設維吾爾語文、漢語文、算術、音樂和體育等課程，1933年受戰亂的影響被迫關閉。奇台縣志編輯委員會：《奇台縣志》（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96。

的實際統治者麻木提師長(1887?-1944)所共同推動的，旨在對抗傳統派的「新式教育與民族復興」運動，¹⁴並接觸到突厥語文文字改革的議題。

突厥語族文字的拉丁化改造，也從兩個層面涉及到俄羅斯—蘇聯的語言政治和族群政治。首先，以泛突厥主義為背景的突厥語族文字改革，部分目標在於抵銷沙皇俄國擴張期大斯拉夫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同時在價值傾向上追求「進步」，反對「落後」，這一點與布爾什維克的反沙皇革命在對抗的對象和部分意識形態目標上意外重疊，因而受到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的支持；其次，突厥語族文字拉丁化改革背後所隱含的泛突厥主義背景，對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的國族整合目標構成挑戰，在蘇維埃政權穩固後，勢將受到質疑和壓制。

二、從連結蘇維埃到連結俄羅斯主體文化

奧圖曼與它的繼承者土耳其共和國是突厥語文字拉丁化的始作俑者的事實，早已為布爾什維克所知，但這個文字改革背後的泛突厥主義背景，卻要等到 1930 年代中期，始成為蘇維埃當局關注的焦點。革命之初，俄國布爾什維克曾與反對沙皇體制的泛突厥主義者，尤其是其中的左翼，建立政治同盟關係；¹⁵1920 年代，保守、反共的伊斯蘭世界，才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直接威脅。1920 年 8 月，倡導突厥民族解放與伊斯蘭反帝復興的中亞「扎吉德」運動左翼集團與布爾什維克聯手，發動反對布哈拉汗國埃米爾的暴動，9 月宣布布哈拉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¹⁶

¹⁴ 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頁 205-221。

¹⁵ 陳繼周、李理譯：《俄國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簡論》，收於「雙泛」研究課題組編譯：《「雙泛」研究譯叢》第 2 輯（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1992 年），頁 18-126。

¹⁶ 王智娟：〈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東歐中亞研究》1998 年第 2 期，

1926年2月，蘇聯開始在境內各突厥語民族中推行以拉丁字母拼寫的新文字，取代長期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舊文字，學理上的理由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文字與突厥語言間存在衝突，¹⁷但政治上的用意則在於切斷突厥語穆斯林與波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聯繫。¹⁸其中，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和維吾爾人分別於1928年、1929年和1930年改用拉丁化新文字。¹⁹到1936年，蘇聯境內的突厥語族諸語文拉丁化新文字已大致普及，蘇聯再度發覺，新文字與1929年完成拉丁化的土耳其文極為接近，又為突厥語各族從正在一方面推行世俗化、西化，另一方面流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現代土耳其接受資訊、思想與文化影響提供了便利。²⁰

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初，蘇維埃政權對泛突厥主義與伊斯蘭改革運動採取利用、容忍的態度。1921年，布哈拉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通過共和國憲法，仿效土耳其改革，共和國內的公文處理都轉用突厥語文，還引進土耳其的文化綱要等。蘇維埃政權初步鞏固後，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左翼泛突厥主義者，轉而對蘇聯的整合構成威脅。²¹

頁84-92。

¹⁷ 從1922年至1930年9年間，原本使用阿拉伯字母、蒙古托忒字母(todo bičig)、希伯來字母、敘利亞字母的近20種文字都實行了拉丁化。在1920-1932年這12年中，蘇聯先後新創制了近50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240-241。

¹⁸ John McLeish, "The Soviet Conquest of Illiteracy," *The Albert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8 (1972): 307-326；王尚達、王文：〈蘇聯對中亞的語言政策：評論和反思〉，《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年第6期，頁72-77。

¹⁹ 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的一段時間，俄國、蘇聯境內的維吾爾人也曾使用察合台文。1925年6月在阿拉木圖召開的第一屆維吾爾教育協商會議通過改革維吾爾察合台文的決議。1928年5月，當時的烏茲別克首都撒瑪爾罕舉辦第一屆維吾爾語言暨正字法會議，研擬將維吾爾文字改為拉丁字母的方案。1930年在阿拉木圖召開了第二屆維吾爾語言暨正字法會議，會議通過第一屆會議所作的關於維吾爾文字的決議，確定推廣維吾爾文拉丁化方案。吳宏偉：〈中亞文字改革問題〉，《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3期，頁5-9。

²⁰ 潘志平：〈泛突厥主義文化觀的內容與本質〉，頁56-68。

²¹ 加文·漢布里(Gavin Hambly)著，吳玉貴譯：《中亞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267。

到 1920 年代中期，蘇維埃政權感到，將中亞突厥語地區的政治、文化、教育與經濟整合到蘇維埃制度和計畫經濟的目標面臨障礙。列寧決定，首先從政治上分化「突厥民族」，透過「民族識別」，並在此基礎上分別建立「民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民族自治州」，打破「突厥民族」整合的契機。²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達林甚至流放了全體克里米亞韃靼人，泛突厥主義在蘇聯遭受到致命打擊。²³

蘇維埃政權進而介入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文化方面。1930 年代中期，史達林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分散體制轉為集權體制；在民族關係上，也將「反對大俄羅斯主義」轉為「重點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俄羅斯語文被定為蘇聯各民族的共同交際工具。1938 年，蘇聯規定全國所有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學習俄語，意圖使中亞各突厥語民族和蘇聯其他少數民族，一起成為蘇聯以「俄羅斯化」手段所建立的，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蘇聯人民」的一部分。從 1936 年當年開始，蘇聯以拉丁字母數量不足，難以準確拼寫阿爾泰語系語言，且「不能適應新的民族關係」，西里爾（Kirillica）字母則不僅拼音準確，²⁴ 且有利於從俄語中吸收新字彙為由，²⁵ 為包括蘇聯勢力範圍

²² 王智娟：〈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頁 84-92。

²³ 相關研究可參考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在多數時期，史達林同樣也不能容忍新疆穆斯林在蘇聯境內從事帶有泛突厥主義訴求的活動。1920 年代末期，賽福鼎·艾則孜的 3 名兄長到蘇聯經商，其中長兄穆伊丁在蘇聯加入了一個名為「東突厥斯坦解放同盟會」的秘密組織，被蘇聯政府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亞監獄服刑 15 年，獲釋後被送到靠近北極圈勞動營繼續「改造」。1950 年，賽福鼎作為新疆省代表參加中蘇共有關新的友好同盟條約談判時，才探聽到穆伊丁的下落。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頁 37-38。

²⁴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拉丁字母在表音結構方面比俄文的西里爾字母系統貧乏：拉丁字母表只有 26 個，其中一些字母發音重複；而俄語字母表有 33 個字母，並且沒有一個字母與別的字母相重。使用拉丁字母作為字母表的基礎就需要增加較多的補充字母和字母發音符號。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頁 240-241；吳宏偉：〈中亞文字改革問題〉，頁 5-9。

²⁵ 真正重要的原因在於構成沙皇俄國和蘇聯基石的斯拉夫人——包括俄羅

內包括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在內的語言，制訂了以俄文等斯拉夫語言使用的西里爾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方案，各民族共和國一致停止文字拉丁化進程，放棄已經拉丁化的字母，轉用西里爾字母。²⁶至1946年，中亞、外蒙古和西伯利亞各非俄羅斯民族全部改用西里爾化新文字。其中，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於1940年，維吾爾人於1946年改用西里爾化新文字。²⁷194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也將使用托忒字母(todo bičig)的蒙古文文字改為西里爾字母。²⁸

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於1917年取得成功，並在「民族識別」的基礎上，於前俄屬突厥斯坦建立各蘇維埃加盟共和國之後，進入新疆的中亞師資與出版品，開始強烈反映出共產主義和更多的民族主義之影響。

十月革命後，鄰近俄屬中亞的喀什地區和伊犁地區有大約20%的人前往新的蘇維埃國家謀生。一些人從事季節性工作；另一些則在蘇俄境內長期定居。布爾什維克顯然不願放棄對中國一側的突厥人直接灌輸共產主義意識的機會。1928年至1930年間，僑居蘇聯的一些新疆穆斯林加入蘇共，或成為親蘇分子，並辦了一份蘇維埃式的維吾爾文報紙《掙脫》。該報有察合台維吾爾文和拉丁化維吾爾文兩種版

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民族使用以西里爾字母為基礎的文字。此外，還有一些民族在沙俄晚期創制文字時就已經制定了以西里爾字母為基礎的字母表(如雅庫特、哈卡斯、楚瓦什等)；也有人主張，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改革或創造文字，形同疏遠了這些民族與其他已經使用西里爾字母的民族之間的聯繫。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頁240-241；吳宏偉：〈中亞文字改革問題〉，頁5-9。

²⁶ 從1936年起，所有十月革命以前沒有文字的民族，與曾使用以阿拉伯字母，絕大多數又已經拉丁化的文字的民族，都創制或改用了以西里爾字母為基礎的文字。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頁240-241。

²⁷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雜議〉，《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1期，頁27-30、33。

²⁸ 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頁240-241。

面，後者正是蘇聯為中亞突厥人製造拉丁化新文字時期的產物。這份報紙與返鄉僑民一道，成為渲染蘇維埃制度下物質進步與民族平等狀況的傳聲筒。²⁹

與蘇聯突厥語諸民族文字改革的戲劇化歷程同步，1930 年代後期至 1943 年，親蘇的新疆地方軍政領袖盛世才曾在省內部分維吾爾、哈薩克和蒙古中、小學中，推行過蘇聯版的西里爾字母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蒙古文教學。³⁰ 與此同步，1937 年，新疆一些維吾爾語言學者又參照蘇聯的拉丁化維吾爾新文字，製作新疆的阿拉伯字母維吾爾文新方案，取消維吾爾文中讀音重複的阿拉伯字母，添加若干維吾爾語音需要的新字母，其中字母數量、排列順序和讀音皆與拉丁字母相同，可謂半調子拉丁化方案。1938 年到 1940 年期間，《新疆日報》刊登了一些用這種字母撰寫的文章。³¹ 但由於新疆的維吾爾方言較為複雜，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不久後決裂，這一個「半調子」方案未能推廣，而與此同步的西里爾化文字改革也隨之告終。

三、「社會主義理想」之下的語言文字政策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的族群政治設計中始終穿插著理想面與現實面，一方面維護少數族群權益，另一方面更致力於國家整合；當二者處於衝突態勢時，前者必定讓位於後者。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第 53 條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協會的工

²⁹ 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頁 78-82。

³⁰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烏魯木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12 年），頁 132。

³¹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芻議〉，頁 27-30、33。

作目標是研究漢字改革，但同時也研究漢語規範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議題。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1954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組為國務院下屬的政府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貫徹新國家語言政策的專業執行機構。³²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鑑於新疆境內的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所採用的阿拉伯—波斯拼寫系統無法呈現所有元音的現象，對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使用的阿拉伯字母做了局部改造，儘量表示所有的元音，避免在閱讀時需要從文中推測讀音。然而，由於依照阿拉伯—波斯文拼寫方式拼寫，自右向左的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與數學算式、公式、科學符號等方向相反，同時也不能完善地表示語言中的每一個元音，受到蘇聯文字改革影響的維吾爾、哈薩克知識分子，乃訴諸文字改革的要求。³³

1950年10月，由前伊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菁英所組成的民主黨派——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在迪化舉辦語言文字座談會，邀請參加新疆省文化教育會議的代表參與，討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與改革的議題，其中包括維吾爾、哈薩克文未來在拉丁字母與西里爾字母間取捨的議題。³⁴

在1950年代初的中蘇蜜月期，「學習蘇聯」既是政治正確，也是流行的選項。少數民族語文領域也出現「學習蘇聯」風潮，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聘請蘇聯語言學家教授蘇聯各民族文字

³² 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收於周玉忠、王輝主編：《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理論與國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67-86。

³³ Bahargul Hamut and Agnieszka Joniak-Luthi, "The Language Choices and Script Debates among the Uyghur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Linguistik Online* 70, no. 1(2015): 111-124.

³⁴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雜議〉，《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1期，頁27-30、33。

創制史，除解釋蘇聯少數民族文字西里爾化的理由外，更特別強調西里爾字母的優越。1951年2月，親蘇的前伊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菁英在伊寧召開「51人座談會」，與會人士一致主張維吾爾文西里爾化。³⁵

1954年5月，中共透過「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向政務院提交〈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主張「各民族新創拼音文字的字母形式，鑑於採用拉丁字母較現行漢語注音字母（意指注音符號）有若干便利，在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公布之前，目前基本上可以拉丁字母作為試行字母或記音符號，將來再考慮改變。某些民族因鄰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可依其自願使用俄文字母（西里爾字母）」。³⁶

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確定文字改革的核心方向，包括推廣漢語普通話、簡化漢字、制訂以漢字拉丁化為目標的漢語拼音方案；針對少數民族文字作出全面規劃，於1956年到1957年完成對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於1956年到1958年完成創制和改進文字方案的設計。³⁷

1955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為推動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對應的「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出身1949年之前伊寧左翼民族主義陣營的阿不都拉·扎克洛夫（1918-1981）任烏魯木齊市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負責維吾爾文字改革工

³⁵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在伊寧新盟積極分子參加召開關於「民族自治」座談會的簡報〉（1951年3月2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3，卷號10。

³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1954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221次政務會議通過），內容引自陳雲華：〈對當代新疆少數民族文字變革活動的回顧與思考〉，收於當代中國研究所編：《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三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頁37-50。

³⁷ 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頁67-86。

作；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州長賈哈達·巴巴里科夫（1955.6-1958.5任州長）任伊犁州的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主任，負責哈薩克文字改革工作。他們一致希望回到盛世才時期呼聲甚高的西里爾化方案的起點。³⁸ 同期，在突厥語諸族群文字西里爾化的呼聲之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的代表前往北京，在「全國第一屆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上，提出參考蘇聯突厥語諸民族文字制訂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以及蒙古、錫伯5個族群的西里爾化新文字方案。³⁹

會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人民委員會將民族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改組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作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轄下的政府機構；同時，分別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和新疆各蒙古族、錫伯族、塔吉克族自治地方建立了官方的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⁴⁰

1956年3月1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少數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式和實驗推行分工的通知〉。1956年8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依照國務院通知的內容，舉行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科學討論會。會議確定：「（新疆的）烏孜別克、塔塔爾兩個民族的文字採用蘇聯烏茲別克和韃靼族目前使用的斯拉夫文（西里爾）字母的文字」。1957年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公布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新文字方案。⁴¹

1956年8月，自治區黨委和人民委員會在烏魯木齊召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根據來自蘇聯哈薩克語

³⁸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3。

³⁹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雜議〉，頁27-30、33。

⁴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76，《語言文字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81-482。

⁴¹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76，《語言文字志》，頁483-484。

區的特聘顧問的建議，會議決議，未來將採用此前由自治區民族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制訂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以及蒙古、錫伯 5 個族群的西里爾化新文字方案。⁴² 會後隨即展開推行西里爾字母新文字的準備工作，在烏魯木齊、喀什和伊寧等地舉辦新文字教師訓練班。1956 年 9 月，依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擬定的計畫，在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錫伯、烏孜別克和塔塔爾等民族的 19 所小學，2,000 多名學生中實施西里爾字母新文字試驗教學。⁴³

官方預期這項改革將方便少數民族學習現代科學，特別是蘇聯的科學課程，並將逐步消滅被認為是不符合現代化和共產主義要求的阿拉伯文伊斯蘭宗教教材。此外，採用統一的字母系統將向著消滅文盲、消滅若干世紀來分割各民族的語言障礙邁出重要一步。對於賽福鼎等前左翼民族主義者而言，這樣做也不全然出於配合中共的動機，

⁴² 1950 年 10 月，聚集前伊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左翼民族主義陣營勢力的政治團體——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在迪化召開語言文字座談會，邀集出席新疆省文化教育會議的各民族文化教育界人士，討論新疆各突厥語族文字改革事宜。1951 年，毛澤東就包括漢語文在內的中國各民族文字改革問題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頁 14。1954 年 5 月，中共國家文化教育委員會、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向政務院提交〈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出：「新疆各民族的文字有可能採用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文字。」1956 年 3 月 10 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少數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實驗推行分工的通知〉。1956 年 8 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依照國務院通知的內容，舉行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科學討論會。會議確定：「(新疆的)烏孜別克、塔塔爾兩個民族的文字採用蘇聯烏茲別克和韃靼族目前使用的斯拉夫字母的文字。」1957 年 2 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公布了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新文字方案。參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 76，《語言文字志》，頁 483-484。

⁴³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 76，《語言文字志》，頁 485-486。

相反，此舉對於完成本世紀初以來扎吉德運動所追求的近代化目標，以及保護伊寧政權尚存的最大遺產之一——直接採用蘇聯教材和教學法的基礎與中等教育體系——具有正面意義。何況站在政治正確的一邊，還有利於名正言順地保存除伊斯蘭以外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⁴⁴

1956年至1957年間，合作化運動和牧區社會主義改造，再加上「文字改革」，這一系列「社會主義高潮」在新疆境內造成了據說「極其複雜、尖銳的」反抗。中共文件列舉了「群眾的意見」，包括文化、教育、衛生部門中的少數民族幹部抱怨漢族師生的「大漢族主義」心態。如，新疆石油學校有一個（由漢族學生組成的）班，因為不滿學校將維吾爾語定為必修課，乃召集會議準備向學校提「最後通牒」；新疆醫學院的教研組不願接受少數民族教師參加教研組，以之為負擔；不讓某些少數民族教師開課，說他學的是20年以前的化學，等等。⁴⁵ 自治區黨委政法部也蒐集政法部門幹部的抱怨，要求漢族和少數民族幹部都要為民族團結盡力，漢族幹部更應主動維護民族團結。文件中指，「漢族幹部和民族幹部在團結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漢族幹部對民族幹部使用少，幫助更少。民族幹部感到維（吾爾）文文件少，在機關裡工作少，因而不願在自治區級機關工作，願意下去做群眾工作」。還有，「少數青年學生剛參加工作，就以培養幫助少數民族幹部自居。對學維（吾爾）文、維（吾爾）語，不少幹部仍存在著抵觸情緒，認為用處不大，不如學其他東西；對不積極學習維（吾爾）文、維（吾爾）語是大民族主義表現的說法，認為是扣大帽子壓人。不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的現象時有發生。」⁴⁶

⁴⁴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1955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輯（2007年12月），頁217-275。

⁴⁵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文教部辦公室：〈關於當前自治區文教衛生系統職工和知識分子中不良思想傾向的報告〉（1957年2月5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57年第144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44。

⁴⁶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法部：〈目前政法幹部中的一些情況反應〉

1957年2月22日，自治區黨委發布〈關於改進和加強漢族幹部學習本地民族語文和本地民族幹部學習漢文漢語的指示〉，公布黨委所作的一項調查結果，即在學習兄弟民族語文上，「漢族幹部的積極性比少數民族幹部少」，因此「應切實加強思想動員」。指示稱：「新疆第二屆黨代表會議〈關於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義傾向的決議〉中指出：語言文字是聯繫當地各族人民，溝通思想感情，實現政策，開展各項工作的首要關鍵。每個外來漢族幹部均應爭取在兩、三年內學會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字。爲此，針對漢族幹部，（一）各級黨委要抓緊對學少數民族語言的領導。（二）具體要求：三、五年內能看懂維文的一般文件。（三）學習方法：各地以專區、自治州爲單位，在各黨校、幹校中舉辦少數民族語文短期輪訓班（3至6個月）。針對自治區本地少數民族幹部，（自治）區級三、五年內，專區、州、縣五、六年內漢語水平提高到會話和閱讀一般漢文報紙及文件。每週辦公抽出2至3小時，組織輪訓班；黨校、幹校應舉辦半年以上專業訓練班。」文件最後還附加一項顯然也是針對（中共修辭中的）「大漢族主義」傾向的通知，即從1957年開始，在所有漢文出版品上，「鮑爾漢」均改譯爲「包爾汗」。⁴⁷

四、與以漢語拼音爲工具的 「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接軌

正當新疆突厥語的西里爾化文字改革與「反對大漢族主義」政治攻勢同步推展之際，漢語文的文字改革議題與全大陸範圍內的「反

（1957年2月5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 1957年第144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44。

⁴⁷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關於改進和加強漢族幹部學習本地民族語文和本地民族幹部學習漢文漢語的指示〉（1957年2月22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57年第153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53。

右」政治運動半路殺出，打斷了這一進程。

漢語的書寫形式採用表意文字，而除漢人外，中國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文書寫形式多為拼音。在「五四」以來的西化氛圍中，表意文字被視為落後，漢文文字改革的最終方向，是徹底廢除表意形式，全面實現拼音化。1951年，毛澤東（1893-1976）就包括漢語文在內的中國各民族文字改革問題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⁴⁸

在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音方案」於1958年2月公布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語文教學與漢語文工具書仍繼續使用由中華民國教育部於1912年制訂的注音符號（時稱「注音字母」）；但在文字拼音化改革方案上，採用民族形式字母、西里爾字母、拉丁字母的主張並存。1952年2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下設拼音方案組，曾擬定出若干種以漢字草書筆畫為字母的民族形式拼音方案。1957年10月，漢語拼音方案最終確定使用拉丁字母，而非社會主義老大哥使用的西里爾字母。少數民族新文字方案有必要依照此一現狀重新考慮。

1957年12月，國務院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頒布名為〈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的政府文件，其中的中心原則是：創制和改革少數民族文字，應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相同或相近的音，儘可能用漢語拼音方案中相當的字母表示；各民族的文字，特別是與語言關係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寫規則上應當儘量取得一致。⁴⁹北京就少數民族文字議題確立了設計字母的原則和創造文字時應遵循的一般原則。

1. 創制新文字應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原有文字改革，採用新的字母系統時，也應儘可能以拉丁字母為基礎。

⁴⁸ 中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頁14。

⁴⁹ 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頁67-86。

2. 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相同或相近的音，盡可能用漢語拼音方案裡相當的字母表示。
3. 少數民族語言裡有而漢語沒有的音，若使用一個拉丁字母表達一個因有困難時，在照顧到字母系統清晰、字形簡便美觀、字母數目適當、便於教學使用的條件下，根據語言的具體情況，可採用以下的方法表示：
 - (1) 用兩個字母表達一個音；
 - (2) 另創新字母或採用其他適用字母；
 - (3) 個別情況也可在字母上附加符號。
 - (4) 對於語言中的聲調，根據實際需要，可在音節末尾加字母或者採用其他辦法表示或不表示。
 - (5) 各民族的文字，特別是語言關係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寫規則上應儘量取得一致。⁵⁰

少數民族文字改革原則公布之際，新疆整肅的重點轉向少數民族。「反右」於 11 月底變調成爲新疆的「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

1958 年 1 月，「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在即，周恩來（1898-1976）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的一場演講中指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中文拼音方案；周強調：「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爲基礎，並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儘量跟漢語拼音取得一致。可以預料，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對於各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後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將有極大的利益。」⁵¹

⁵⁰ 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起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會議修改通過：〈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1957）。該文件的內容，可參見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頁 67-86。

⁵¹ 周恩來說：「中文拼音方案還可以用來拼寫普通話，作爲教學普通話的有效工具。學習普通話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夠的，學了容易忘記，必須有一套標音符號，用來編印拼音的讀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學習的人隨時查考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遵循中共中央的決策方向，決撤銷原「新疆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委員會」，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會主任先後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1921-1976）和賽福鼎·艾則孜擔任，賽福鼎還兼任黨組書記，出身蒙古族的格爾夏擔任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⁵² 委員會的政治性目標即在於制定、推行與漢語拼音方案接軌的突厥語文字拉丁化方案。需要註明的是，出身新疆蒙古族的格爾夏，曾參與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新疆各民族文字改革的完整過程，他在本世紀初所撰寫的回憶錄中提供了不少相關的歷史細節。由於格爾夏在文化背景上既非突厥語族，也不是漢人，他的回憶文字並沒有太多特定文化中心主義的取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958 年 6 月，在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協助下，新疆

斷校正自己的發音，收效才大。……今後我們採用拉丁字母的中文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是科學技術等方面廣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觸的機會很多，學過之後就容易忘記。因此，採用這套字母，對於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好處。……中文拼音方案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有五十多個民族，其中有許多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雖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進。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漢族用漢字外，有用藏文字的，有用蒙文字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鮮字母的，還有用其他字母的。這些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時候，應該以什麼字母為基礎呢？能不能就用漢字作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呢？過去曾經有人這樣試過，沒有成功，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幾十個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這不僅對於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經驗是個障礙，而且印刷、打字、電報設備勢必各搞一套，對於各民族今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利。……漢語現在既然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確定這樣一個原則：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並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儘量跟中文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預料，中文拼音方案的制定對於各兄弟民族的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後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將有極大的利益。」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報告，1958 年 1 月 10 日），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頁 190-191。

⁵²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 137。

維吾爾自治區文字改革委員會秉承周恩來揭櫫的原則方向，設計制定出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新文字方案(草案)」和「哈薩克新文字方案(草案)」。

在草案徵集意見期間，新疆當局多次舉辦新文字改革座談會，會上，拉丁化方案遭遇到來自傳統派和親蘇派兩方面的抗拒。時任自治區石油局副局長吉拉諾夫即稱，伊斯蘭經文文字自右而左書寫，自左而右書寫的拉丁化文字無異於「卡泊爾」(異教徒的)文字，宗教界的反彈會很強烈；有人附和表示，維吾爾文字應該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進行改革。出身前伊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左翼民族主義陣營的賽都拉·賽甫拉也夫、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等人則主張延續西里爾字母文字改革方案。與會的格爾夏向王恩茂報告會上反對新文字改革的兩種意見，王當即協請賽福鼎親自出面說服民族宗教人士，賽福鼎對二道橋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熱合曼等人說：「要認真執行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視的口氣把不信教的人稱為『卡泊爾』，更不能說新文字是『卡泊爾』文字。」⁵³

1959年7月20日，自治區黨委書記處開會討論文字改革問題，賽福鼎發表談話，傳達並闡揚北京的意旨，即維吾爾、哈薩克等新文字將採用拉丁字母，並依照漢語的發音規則，增加漢語借詞。賽福鼎說，少數民族靠自己的語言不可能迅速發展文化、科學與技術。在解釋和論證這一改革時，賽福鼎再三說到融合與同化問題，強調指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獨自發展。他說，某些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反對這場改革，拒絕從漢語中吸收新的技術內容，反而鼓吹從外國(蘇聯)語言中吸收字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阿不都拉·扎克洛夫這次也以官方立場解釋說，1956年那個採用斯拉夫字母的決定不過是試驗性、臨時性和過渡性的，「根據當前實際工作與具體情況，我們發現最適用的不是斯拉夫字母而是拉丁字母」。⁵⁴新方案

⁵³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7-138。

⁵⁴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

考慮到了中國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與共同利益，文字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使漢語逐步成爲社會交往的共同語言。

拉丁化文字改革的動機，與第一次公布西里爾化改革方案相同的部分是，黨希望藉此打破伊斯蘭教對當地人民特別是青年的控制，從而造成中國化的局面。結果是，少數民族的一部分歷史和文化遺產將被送入博物館，爲中國式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所替代。⁵⁵ 與上一方案不同的是，中共這次打算盡力消除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切斷當地的突厥穆斯林與中蘇邊界另一側的同胞之間的聯繫。⁵⁶ 不過，爲減緩此舉對曾採用蘇聯編印的突厥語文教材的伊犁、塔城等地區學校的衝擊，或者更多地是顧及少數民族因種種原因累積的不滿，中共還是決定推遲文字改革試行的期限，新方案拖延到1960年開始試行，至1965年才開始推廣。

經1959年底自治區第二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討論，拉丁字母「維吾爾新文字方案(草案)」和「哈薩克新文字方案(草案)」呈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審查通過，於同年12月頒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同時宣布，廢止3年前爲相同機構通過頒行的西里爾字母「維、哈新文字方案(草案)」。

自1960年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開始在境內的烏魯木齊、喀什、伊寧等城市的小學、中學推動新文字試驗教學，在部分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推行新文字。1962年，自治區黨委根據維吾爾、哈薩克文字改革試點工作的經驗，決定於1965年在全疆維吾爾、哈薩克等

黨校：《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49.10-1966.4)》上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90。

⁵⁵ 1960年代初，以新疆少數民族語文翻譯毛澤東著作的工作，受益於以拉丁化文字直接吸收漢文詞彙的設想，推進得相對順利；有人主張維吾爾等語文與阿拉伯文在語言文字結構上近似，但在格爾夏看來，後者難以表述毛澤東著作中的新名詞和新術語。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8。

⁵⁶ 接受近代教育的維吾爾人多主張從俄文中借詞。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9。

各級各類學校和全疆機關幹部及廣大群眾中普遍推行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⁵⁷

1963年6月，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舉辦「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科學討論會」，檢討推展試驗中出現的問題，並依討論內容，對兩個方案（草案）做了修訂，呈報自治區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人代會通過修訂方案，決議呈請國務院核准，在自治區內全面推廣。審議結論稱，「自治區文改會修訂的維、哈新文字方案是成熟的，它比老文字有很多的優越性，既能充分表達維吾爾、哈薩克語言的特點，又能適應各民族語言共同成分日益增加的發展趨勢。……在拼寫借詞方面更為方便，在書寫方面更符合科學的要求」。⁵⁸而事實上，到1964年為止，維吾爾、哈薩克機關幹部、學生和知識青年當中，已有高達130萬人學會讀、寫新文字。⁵⁹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於1964年4月呈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同年10月經國務院核准，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確定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拉丁化維吾爾、哈薩克拉丁文字，為維吾爾、哈薩克民族的法定文字。⁶⁰由自治區於1965年元旦正式公布，在自治區內全面推行。

在維吾爾、哈薩克新文字迅速推行之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字改革委員會進一步起草了新疆蒙古托忒文的拉丁化文字方案，並為柯爾克孜族創制了拉丁化文字方案。

1982年，在自治區召開的第四屆人大會議上，曾強烈主張西里爾化文字改革方案的賽都拉·賽甫拉也夫（1918-2002）突然提議恢復阿拉伯字母維吾爾、哈薩克舊文字。會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少數服從多數，廢除了維吾爾、哈薩克文拉丁化新文字，通過賽都拉·

⁵⁷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9。

⁵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76，《語言文字志》，頁486-487。

⁵⁹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9。

⁶⁰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139-140。

賽甫拉也夫提案。⁶¹ 賽都拉·賽甫拉也夫的立場轉折顯示出，面對北京主導的文字改革方案中「社會主義化」和「中國化」傾向，前突厥語穆斯林左翼民族主義陣營也出現了與突厥語穆斯林傳統社會相近的反彈。

五、結語

平心而論，與阿拉伯字母維吾爾、哈薩克舊文字相較，維吾爾、哈薩克文拉丁化新文字有明顯的優勢，在資訊化時代，這種優勢更加凸顯。但新疆突厥語文字改革的過程，一直與政治密切相關，以致於新文字在 1980 年代的遭到廢止，也是一種對於政治化文化政策的政治化反彈。

現代國家通常都會制訂以國族整合為目標的語言政策，但其實踐過程，往往必須在國族整合與保持文化多元之間尋求平衡。1950 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拉丁化方案的興廢，呈現出這種理想狀態失衡的後果。

當然，期待語言文字與政治徹底脫鉤，在可見的未來，仍然可能是天真的想像。

⁶¹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頁 140。

徵引書目

-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在伊寧新盟積極分子參加召開關於「民族自治」座談會的簡報〉（1951年3月2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0，目錄3，卷號10。
-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49.10-1966.4）》上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文教部辦公室：〈關於當前自治區文教衛生系統職工和知識分子中不良思想傾向的報告〉（1957年2月5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57年第144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44。
-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法部：〈目前政法幹部中的一些情況反應〉（1957年2月5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57年第144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44。
-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關於改進和加強漢族幹部學習本地民族語文和本地民族幹部學習漢文漢語的指示〉（1957年2月22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檔案，1957年第153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目錄9，卷號153。
- 中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
- 王尚達、王文：〈蘇聯對中亞的語言政策：評論和反思〉，《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年第6期，頁72-77。

- 王智娟：〈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2期，頁84-92。
- 王樹梅：〈泛突厥主義的由來和發展〉，收於陳延琪、潘志平編著：《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41。
- 加文·漢布里 (Gavin Hambly) 著，吳玉貴譯：《中亞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 吳宏偉：〈中亞文字改革問題〉，《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3期，頁5-9。
-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1955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輯，2007年12月，頁217-275。
- 易卜拉音·木依提 (Ibrahim Muhiti)：〈回憶啟蒙運動的先驅者買合蘇提·木依提〉，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1-96。
- 奇台縣史志編輯委員會：《奇台縣志》，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
- 烏·阿·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芻議〉，《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1期，頁27-30；33。
- 陳雲華：〈對當代新疆少數民族文字變革活動的回顧與思考〉，收於當代中國研究編著：《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三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頁37-50。
- 格爾夏口述，王永慶整理：《歷史的回聲——格爾夏回憶錄》，烏魯木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12年。
- 陳繼周、李理譯：《俄國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簡論》，收於「雙

- 泛」研究課題編譯：《「雙泛」研究譯叢》第2輯，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1992年，頁18-126。
- 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收於周玉忠、王輝編著：《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理論與國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67-86。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新疆通志》卷76，《語言文字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 熱合木吐拉·艾山：《新疆維吾爾族扎吉德教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
- 潘志平：〈泛突厥主義文化觀的內容與本質〉，收於陳延琪、潘志平編著：《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6-68。
- 潘志平：〈俄國韃靼斯坦「扎吉德」運動與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頁23-34。
- 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
- Hamut, Bahargul, and Joniak-Luthi Agnieszka. "The Language Choices and Script Debates among the Uyghur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Linguistik Online* 70, no. 1 (2015): 111-124.
- M. Landau, Jacob. *Pan-Turkism in Turkey: A Study in Irredentism*.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81.
- .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cLeish, John. "The Soviet Conquest of Illiteracy." *The Albert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8 (1972): 307-326.
- Yalın, Nafi.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Unique Case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World." *Bilim dergisi* 3 (2002): 9.